

談陳獨秀與顧準

● 靳樹鵬

1915年，上海誕生了開一代風氣的雜誌《新青年》（初名《青年雜誌》），也誕生了繼承《新青年》之志的思想家顧準。顧準還在咿呀學語之時，陳獨秀和他的朋友們已經向封建禮教展開了猛烈抨擊。顧準小陳獨秀36歲，他19歲時在上海成立自發的馬克思主義小組並進而參加黨組織時，陳獨秀已因參加托派活動被開除黨籍，後被拘押在國民黨的監獄中。顧準當然知道陳獨秀，陳獨秀大概不會知道顧準，他們也不大可能見過面。

有友人認為我把陳獨秀與顧準加以比較不甚相宜，這見解有道理。陳獨秀曾指揮過千軍萬馬，創造過輝煌，顧準則無此業績；反之，後死的顧準對某些問題的探索，陳獨秀也未及見。但我認為，後人是可以把凡在歷史上留下爪痕的人聯繫評說的，而把陳獨秀和顧準略作比較饒有意思，更何況他們追求真理的執着精神相同，追求的目標也大體一致。《顧準文集》中連陳獨秀的名字也沒出現過，但該書寫道：「若無歐風東漸，

五四運動何能掀起，孔子怎能打得倒？科學與民主我們還是太少」，「五四的事業要有志之士來繼承」^①。可見顧準對陳獨秀發動和領導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劃時代意義有着最充分的認識，他還勇敢的繼承開拓，實盡而亡。

陳獨秀和顧準都是淵博的，甚至可以說是學貫中西。顧準對西方思想史的研究可能比陳獨秀更精細，但對中國思想文化的研究則可能不如陳獨秀，這是因為他們所處的時代不同，比如陳獨秀曾參加科舉，而顧準出生時科舉制度已經消亡。他們為追求真理，不惜身家性命，惟其如此，他們的後半生都艱難坎坷；五十多年前陳獨秀在四川江津，二十多年前顧準在北京，都死得十分淒涼。他們都在前人和同時代人創造的思想學說基礎上，為現實、為未來不倦地進行探索。陳獨秀多側重於現實論爭，顧準則多側重於各種理論的比較疏理和判斷；陳獨秀政治味濃一些，顧準則多一些學術氣。他們都尊重權

威，但又不迷信權威；他們都敢於提出自己的創見，特別在政治權威與理論權威二而一的情況下，他們的膽識都是非凡的。

陳獨秀和顧準都是中國傳統思想的嚴厲批判者，都主張打倒孔子這個偶像。五四時代陳獨秀激言暢論：「『孔教』本失靈之偶像，過去之化石」，「對於與此新社會新國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徹底之覺悟，猛勇之決心；否則不塞不流，不止不行」，「應毀全國已有之孔廟而罷其祀」^②。這在80年前是多麼急進的言論，讚賞者不少，反對者更多。「毀孔子廟罷其祀」竟成了北大校園內的著名詩句。陳獨秀絕非危言聳聽，而是對孔教之核心禮教，對三綱五常詳加剖析，指出宋儒與孔子之學相通而不同。他認為，孔子之道絕不適合現代生活，絕不適合世界潮流，其存廢早當解決。「儒術孔道，非無優點，而缺點則正多。……此不攻破，吾國之政治、法律、社會道德，俱無由出黑暗而入光明。」半個世紀後顧準分析了孔子學說與宋儒（以朱熹為代表）的區別，進而指出，「孔子這個偶像應該打倒」，「中國思想是貧乏的」，「只有道德訓條」，「除了倫常禮教，沒有學問」，「中國的傳統思想，……產生不出科學與民主來。……直到現在……還是中國人身上的歷史重擔」。陳獨秀撰文時，天壇祭孔的醜劇剛剛收場，定孔教為國教並載入憲法的輿論甚囂塵上，他才特別辨明把一種教義（或學說）載入憲法之種種不妥，世界上各國憲章也無此先例。面對着尊孔復古的逆流，他持論異常激烈。顧準之論似較和平，實則深刻，他撰文時造神空氣正瀰漫中國，至於中國傳統思想滲透社會生活的各個方

面，他更身受目睹。陳、顧都主張打倒孔子這個偶像，嚴厲批判中國的傳統思想，雖然時差有半個世紀，但都有極強的針對性，都是從中國當時的現實出發的。

有趣的是，他們對歷代不少知識份子所津津樂道的老莊思想都加以痛斥。陳獨秀寫道：「鑄成這腐敗墮落的國民性之最大原因，就是老、莊以來虛無思想及放任主義。」「我們中國學術文化不發達，就壞在老子以來虛無的個人主義及任自然主義。現在我們萬萬不可再提議這些來遺害青年了。因為虛無的個人主義及任自然主義，非把社會回轉到原人時代不可實現……都叫我們空想、頹唐、紊亂、墮落、反古。」^③他對老莊思想深惡痛絕。半個世紀後顧準寫道：「老莊一派的思想，在中國思想史上的作用是怎麼樣也不能忽視的。它從『道』的不可測，直接轉向虛無思想。」「《老子》全書，決不是一在野的聖人探索自然的奧秘（規律），或者人怎樣達於至善的哲學，它是不折不扣的政治哲學，統治哲學。」「他的清靜無為，是一種在政治、經濟、技術、文化、科學、藝術上力求保持現成狀態，甚至主張倒退，不求進步，不求創新，不主張與天鬥與地鬥，以爭奪人類更美好生活的保守主義或倒退主義。」「從歷史進步的觀點來說，都是開倒車的，反動的」，這「正是我們兩千年來停滯不前的原因所在」，「是一個值得大聲疾呼的根本問題」。

他們對老莊思想的批判，連用詞和語氣都很相似。這是毫不奇怪的，因為他們都是積極的入世者，以人類社會發展為己任，生命不息，追求不止，不論遇甚麼樣的厄運逆境，絕不會頹唐，也絕不會隱遁。所不同的

是，陳獨秀言簡意賅，直搏核心，顧準則分條析理，層層剝皮，擊中要害。

陳獨秀和顧準都推重西方文明。顧準坦誠直言：「我是一個『傾心』西方文明的人，我總有以西方為標準來評論中國的傾向，所以老是說要讀點西方史。」他研究西方歷史下了笨功夫，「打算用十年時間，通盤比較徹底研究（先是）西方，（然後是）中國的歷史，並在進行比較研究的基礎上，達成他對歷史未來的『探索』」。他用兩個多月時間寫出的一份筆記《希臘城邦制度》，是他10年研究計劃的開始，剛開始他就病故了，筆記於是成為他未完成的作品。然而在中國關於希臘歷史和思想的著作中，他這本小書是很有價值的。陳獨秀也常把東西方文明對比研究，他可能是中國東西方文明比較研究方面的開先河者，80年前他盛讚西方文明和法蘭西文明那些激越的語言至今還言猶在耳。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是陳獨秀還是顧準，他們所推崇的西方文明的重點之一，都是馬克思主義。他們何以推崇西方文明而貶斥本土文明？他們是不是數典忘祖？我們似不能如此說。大體說來，他們認為東方文化所陶冶出來的精神狀態令他們灰心喪氣。對此，顧準說：「有一種個人主義中國很少見：像布魯諾那樣寧肯燒死在火刑柱上不願放棄太陽中心說；像宗教戰爭或異教迫害中的殉道；像生命可以不必要，航海卻不可不去的冒險精神；像近代資本主義先鋒的清教徒那樣，把賺錢、節約、積累看作在行上帝的道；最後，像馬克思認為是共產主義的基本標幟——每個人都能夠『自我實現』（原話是『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的那種個

人主義。」陳獨秀在80年前寫了一篇〈東西民族思想之差異〉，略謂：「西洋民族以戰爭為本位，東洋民族以安息為本位。」「西洋民族以個人為本位，東洋民族以家族為本位。」「西洋民族以法治為本位，以實利為本位；東洋民族以感情為本位，以虛文為本位。」這都是他們痛感兩千多年來中國停滯不前，近代又倍受凌辱的歷史而發出的感慨。八十多年前的說法是改造國民性，現在的說法是提高人民的整體素質。

再來看一看他們的真理觀。陳、顧都不贊成有甚麼放諸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陳獨秀說：「本來沒有推之萬世而皆準的真理」，「馬克思主義永遠不是教條」。「除了牽強、附會、迷信，世界上定沒有萬世師表的聖人、推諸萬事而皆準的制度和包醫百病的學說這三件東西。」「我們盡可前無古人，卻不可後無來者；我們固然希望我們勝過我們的父親，我們更希望我們不如我們的兒子。」顧準說：「現代邏輯學，承認判斷總是出於經驗的概括。經驗的概括，總只有或然的性質，而不是絕對肯定的。」「說『真理是絕對的』或『能夠是絕對的』這個判斷難於成立……它沒有得到過任何經驗的證實。」正因為「一切斷判都得歸納，歸納所得的結論都是相對的」，因此真理只能是相對的，人的思維不可能具有至上性。

特別值得說一說的是，顧準對馬克思、恩格斯、列寧以及他們前代、同代、後代的哲學家、思想家的諸種學說進行精細縝密的研究和比較後，對辯證唯物主義既提出了哲學的質問也提出了科學的質問。他認為沒有甚麼人、甚麼方法可以發現絕對的、普遍的規律，他認為辯證法是革命的但

不是科學的。他問道：「質量互變，矛盾統一，否定之否定，這三個辯證法規律，是可以用經驗來驗證的嗎？」他進而說：「假如近代科學死守住辯證法三規律，它老早停滯不進了。」他認為，「馬克思按其本性是唯理主義的。革命的理想主義者不能不是唯理主義者。……唯理主義者不得不是神學家」。顧準對馬克思是非常崇敬的，他說馬克思「要克服異化而又反對僧院共產主義、斯巴達平等主義，這是非常非常高的理想，是一種只能在人類世世代代的鬥爭中無窮盡的試驗與反覆中逐步接近的理想。馬克思的學生中未必有幾個人能夠懂得這一點。」「每當大革命時期，飄揚的旗幟是不可少的。所以，理想主義雖然不是科學，它的出現，它起作用，卻是科學的。」「今天當人們以烈士的名義，把革命的理想主義轉變成保守的反動的專制主義的時候，我堅決走上徹底經驗主義、多元主義的立場，要為反對這種專制主義而奮鬥到底！」顧準認為，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都寫成於一百多年以前，後生小子的他，「提出一些問題加以探討，馬克思和恩格斯如地下有知，必定也會讚許」。

顧準對馬克思、恩格斯、列寧以及斯大林的多種著作中的許多問題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包括辯證唯物主義這個最根本的問題。他提出的這些問題都有待進一步研究和探討，而絕對不應該被忽視。

陳獨秀與顧準都堅定的信仰和推崇民主與科學，至死不渝。五四時期，為了回答對《新青年》的種種責難，陳獨秀寫了一篇著名的文章《〈新青年〉罪案之答辯書》，他在文中寫

道：「西洋人因為擁護德、賽兩先生（即民主與科學——引者），鬧出了多少事，流出了多少血，德、賽兩先生才漸漸從黑暗中把他們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們現在認定只有這兩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為擁護這兩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壓迫，社會的攻擊笑罵，就是斷頭流血，都不推辭。」二十多年以後，即陳獨秀逝世前，他仍在反覆思索着這個問題：「科學，近代民主制，社會主義，乃近代人類社會三大天才的發現，至可寶貴；不幸十月以來，輕率的把民主制和資產階級統治一同推翻，以獨裁代替了民主，民主的基本內容被推翻所謂『無產階級民主』『大眾民主』只是一些無實際內容的空洞名詞，一種抵制資產階級民主的門面語而已。」陳獨秀晚年議論較多的還是民主與專政問題。他說：「應該毫無成見的領悟蘇俄二十餘年來的教訓，科學的而非宗教的重新估計布爾雪維克的理論及其領袖之價值，不能一切歸罪於史大林，例如無產階級政權下民主制的問題。」「民主主義是自從人類發生政治組織，以至政治消滅之間，各時代（希臘、羅馬、近代以至將來）多數階級的人民反抗少數特權之旗幟。『無產階級民主』不是一個空洞的名詞，其基本內容也和資產階級民主同樣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罷工之自由。特別重要的是反對黨派之自由，沒有這些，議會或蘇維埃同樣一文不值。」這是陳獨秀思索蘇聯建立無產階級政權後二十多年的經驗，特別是後十年的教訓，尤其是斯大林實行個人獨裁大興冤獄之種種後得出的認識。顧準則是面對着

「十年浩劫」思索這些問題的，他詳細考察論述了民主思想、民主制度發生發展的歷史，他認為主權在民的直接民主制，只能產生在希臘城邦那種特殊的歷史條件下，後來在廣土眾民的世界各國中只能實行間接民主制。「直接民主的口號是人民當家作主。可是希臘歷史上留下來的還是一些英雄。『人民當家作主』其實是一句空話。」所以，「不要奢求人民當家作主，而是考慮怎樣才能使人民對於作為經濟集中表現的政治的影響力量發展到最可能充分的程度。既然權威是不可少的，行政權是必要的，問題在於防止行政權發展成為皇權。唯一行得通的辦法，是使行政權不得成為獨佔的，有人在旁邊『覬覦』的，而且這種『覬覦』是合法的」。「民主不過是方法，根本的前提是進步。唯有看到權威主義會扼殺進步，權威主義是和科學精神水火不相容的，民主才是必須採用的方法。」顧準同陳獨秀一樣，主張允許反對黨的存在。他說：「唯有存在一個政治上的反對黨的時候，才会有真正的批評與自我批評。五十六年蘇聯的歷史，二十四年中國的歷史，難道還沒有充分證明這一點？」我國實行的是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制，這也是政治民主化進程中的一種實踐和試驗。

今天，「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口號提出來了，政治民主化問題也已開始引起重視並提上日程，陳獨秀和顧準的主張終於在一定程度上被政治家們逐漸接受。

陳獨秀和顧準都曾經是馬列主義的忠誠信仰者，腳踏實地的革命者，同時又是淵博的學者。中國共產黨歷史上諸領袖人物中，陳獨秀是在人文科學方面的佼佼者之一，顧準是後起

的共產黨理論家中最博識者之一。他們都沒有為自己留下甚麼金錢財產之類的東西，卻捨生忘死參加革命，堅忍不拔地進行理論追求和學術研究，九死不悔畢其一生，都是為了中國的發展、人類的明天。他們如此光彩的人格更值得崇敬。

1994年，顧準的遺著、他未完成的著作《顧準文集》出版。1995年，陳獨秀的遺著，也是他未完成的著作《小學識字教本》，經過半個世紀的風風雨雨艱難曲折，終於由巴蜀書社出版。這是一部文字學專著，專家嚴學窘教授認為此書有許多真知灼見，足以證明陳獨秀是「我國近代語言學史上傑出的語言學家」。

有人說，陳學（陳獨秀研究）即將形成；而《顧準文集》出版後，亦好評如潮，在北京的購書榜上居高不下。這些都多麼令人欣喜呀！

註釋

① 文中凡引顧準的話均見《顧準文集》（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4）。

② 文中引陳獨秀的話，凡未註明出處的均見任建樹、張統模、吳信忠編：《陳獨秀著作選》，一、二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③ 《陳獨秀文章選編》，中冊（香港：交流圖書公司，1990），頁66。

靳樹鵬 中國現代文化學會陳獨秀研究會理事，現職吉林省建設廳村鎮建設處處長。